



印度译库

Why Growth Matters

How Economic Growth in India
Reduced Poverty and the Lessons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增长为什么重要

来自当代印度的发展经验

[美]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 阿尔温德·帕纳格里亚 著

王志毅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Why Growth Matters

How Economic Growth in India
Reduced Poverty and the Lessons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增长为什么重要

来自当代印度的发展经验

|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 阿尔温德·帕纳格里亚 著
王志毅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增长为什么重要：来自当代印度的发展经验 / (美) 巴格瓦蒂, (美) 帕纳格里亚著; 王志毅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8

(印度译库)

书名原文: Why Growth Matters: How Economic Growth in India Reduced Poverty and the Lessons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ISBN 978-7-308-14782-8

I. ①增… II. ①巴… ②帕… ③王… III. ①经济发
展—研究—印度 IV. ①F13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7630号

增长为什么重要：来自当代印度的发展经验

[美]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 阿尔温德·帕纳格里亚 著 王志毅 译

责任编辑 叶敏

文字编辑 宋先圆

装帧设计 卿松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00千

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782-8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序

当发展经济学家们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考虑哪些国家会脱颖而出，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榜样时，他们拿印度和中国打赌。在长久沉睡之后，巨人们要觉醒了。

印度在一些方面呈现不足，但在另一些方面享有优势：印度继承了极好的公务员制度、非常独立的司法体系、相对自由的媒体，而且还有为独立而奋斗的政治家们将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好处之上。这些现在被称作制度的特征是良善治理的根本要素，而在绝大多数“二战”后独立的国家中，这些特征是相当罕见的。

农学家 Rene Dumont 在《非洲的错误开始》一书中，将从法国手中接管权力的非洲统治者的生活方式与波旁王朝的法国宫廷相提并论！事实上，很快印度就成了后殖民时期的发展中大国中唯一的民主国家，且就算用现在的自由选举、自由出版和独立司法体系来衡量其“自由”民主时也是如此。发

增长为什么重要

来自当代印度的发展经验

展经济学家很少会忽视印度的政治“例外”对经济的有利一面。

相反，中国则是从长征和激烈的内战中摆脱出来的。如果说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提供了什么指引的话，那就是增长的未来中布满了政治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的剧变加重了人们对此的怀疑。直到1980年，中国这个巨人还没有觉醒，它仍然在沉睡。

可是，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们仍然认为中国的前景要好过印度。为什么呢？理由是发展经济学家们总是用简单的模型来做出关于发展产出的判断。那个时候，在经济学家们所广泛赞同的发展模式中，增长依赖于两个参数：你储蓄（投资）了多少以及你从这样的投资中产出了多少。他们习惯于假定储蓄率可以随着政策操纵——典型的是政府能够利用税收来提高国内储蓄率——而改变，而且投资生产率（反映为资本产出率）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动，可以视为基准。

所以，由于生产力要素是中性的，可以推断印度将会败给中国，因为印度无法像中国那样通过税收机制来提高储蓄率，并通过严厉的手段释出储蓄——也即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剩余。^①印度将在这场竞赛中输给中国。

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印度是民主政体，西方国家会提供支持以对抗当时的中国。^②印度在储蓄上无法跟中国相比，只能通过西方国家的援助来提高储蓄率及相应的投资。

那么，印度成了一个外援的接收国，应当能实现快速增长了。事实并非如此。印度巨人也仍然处于沉睡中。

在这差不多30年中，印度和中国都无法快速增长：中国是由于政治原因而实行教条主义的经济政策，要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严格控制。印度则

① 我们后面会涉及的东亚经验表明，由于可营利投资机会的增加，最终私人储蓄率也会提高。这个讨论完全基于征税提高公共储蓄的能力。

② 差不多西方所有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初的发展经济学家都支持印度的成功，其中包括发展经济学的先锋人员，如Paul Rosenstein-Rodan。他们对印度的“热恋”体现在著作以及想通过各种项目在印度工作的意愿中，其中最著名的便是MIT项目，让MIT经济学家Richard Eckaus和Louis Lefebvre，以及Ian Little（牛津）、Brian Reddaway（剑桥）、Trevor Swa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到新德里工作。其他还包括George Rosen和Wilfred Malenbaum。

是由于灾难性的经济政策破坏了其投资所得的生产力。^①

生产力与增长

印度的增长率非常糟糕，这是因为上述基本设想——增加投资所带来的生产力是个技术问题——是错误的。国内储蓄确实形成了^②，但增长远低于预期。投资增长主要集中于公共部门，其生产率低迷不前。复杂的管制体制束缚了那些本来应该很有活力的印度企业家。结果便是持续的低增长率，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实施改革，到了 1991 年则全面铺开（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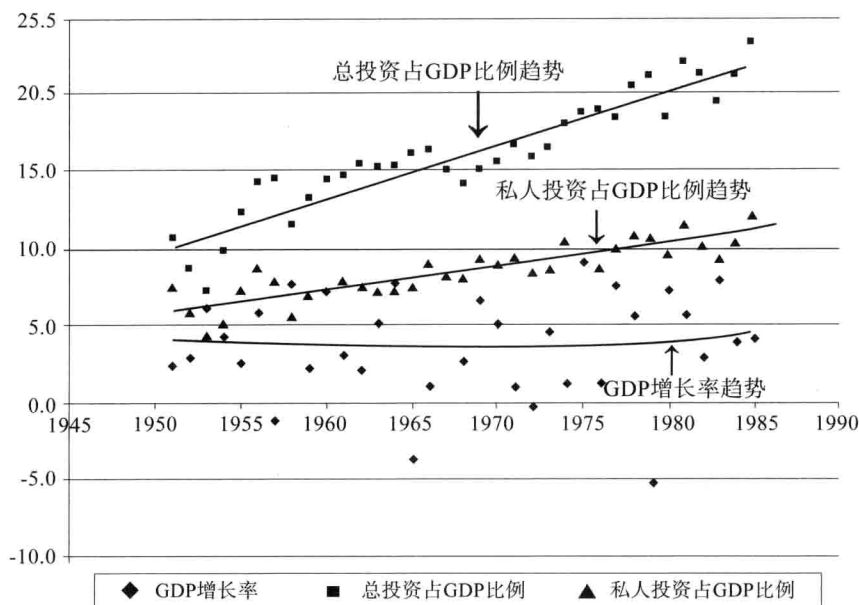


图1 印度：尽管每单位GDP的投资率不断增长，但增长率仍旧低迷

来源：基于印度经济统计手册，2012，印度储备银行，孟买

印度的状况类似于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苏联，储蓄和投资率很高，

^① 中国的自给自足政策是由于站在苏联阵营一方，隔绝于世界经济之外。印度实施自给自足政策则是由于错误的经济教条，而非意识形态原因。

^② 有人认为外援的流入反而逆向地降低了国内储蓄率。但 Bhagwati 和 Srinivasan（1975）的分析认为并非如此。

增长为什么重要

来自当代印度的发展经验

而且不断增加，但增长率却下降（见图2）：流血、流汗、流泪，却没有看到成效。断层的原因在于苏式体系没有将投资用于生产。这要归因于中央计划经济的大手，以及由于“生产工具”的普遍公有制，人们缺乏激励来进行生产和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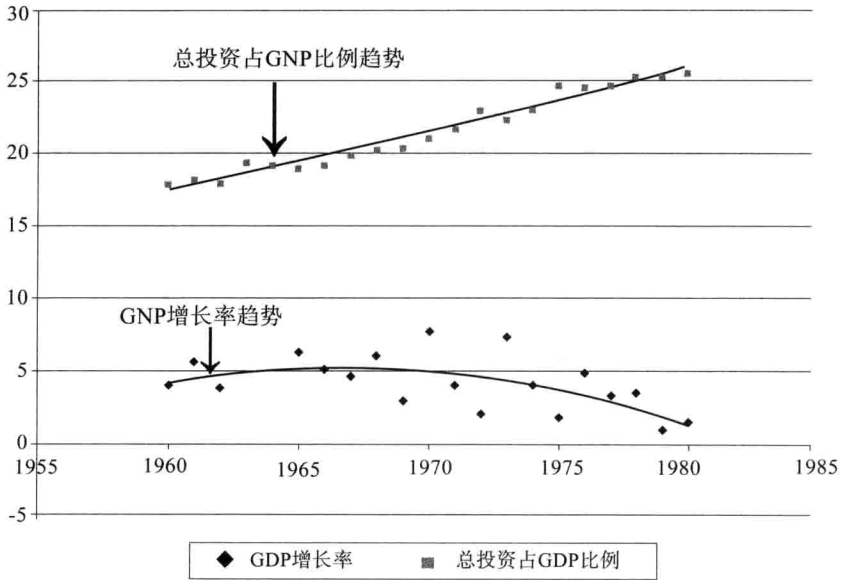


图2 苏联：疯狂的投资，差劲的增长

来源：基于 Desai, Padma, 1987, *The Soviet Economic Slowdown: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相反，东亚经济的特点是有极高的投资率，而且投资生产率也很高，产生了异乎寻常的高增长率，常常被称为“经济奇迹”（见图3）。投资与超常的出口表现紧密相连，这又导致了对先进技术设备的进口需求。^①

① 见 Bhagwati, “The Miracle That Did Happen: Understanding East A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996; reprinted in Bhagwati (1999)。苏联和东亚在投资生产率上的截然相反，让许多人并不赞成克鲁格曼所宣称的东亚经济将步苏联后尘的论调，因为投资积累会导致东亚的收益率递减。最后，东亚经济崩溃的状况并不如克鲁格曼所说的那样缓慢形成，而是突然而至的，是因为在还不成熟的情况下突然开放资本流动造成了巨量资本流入，以及随后的资本流出所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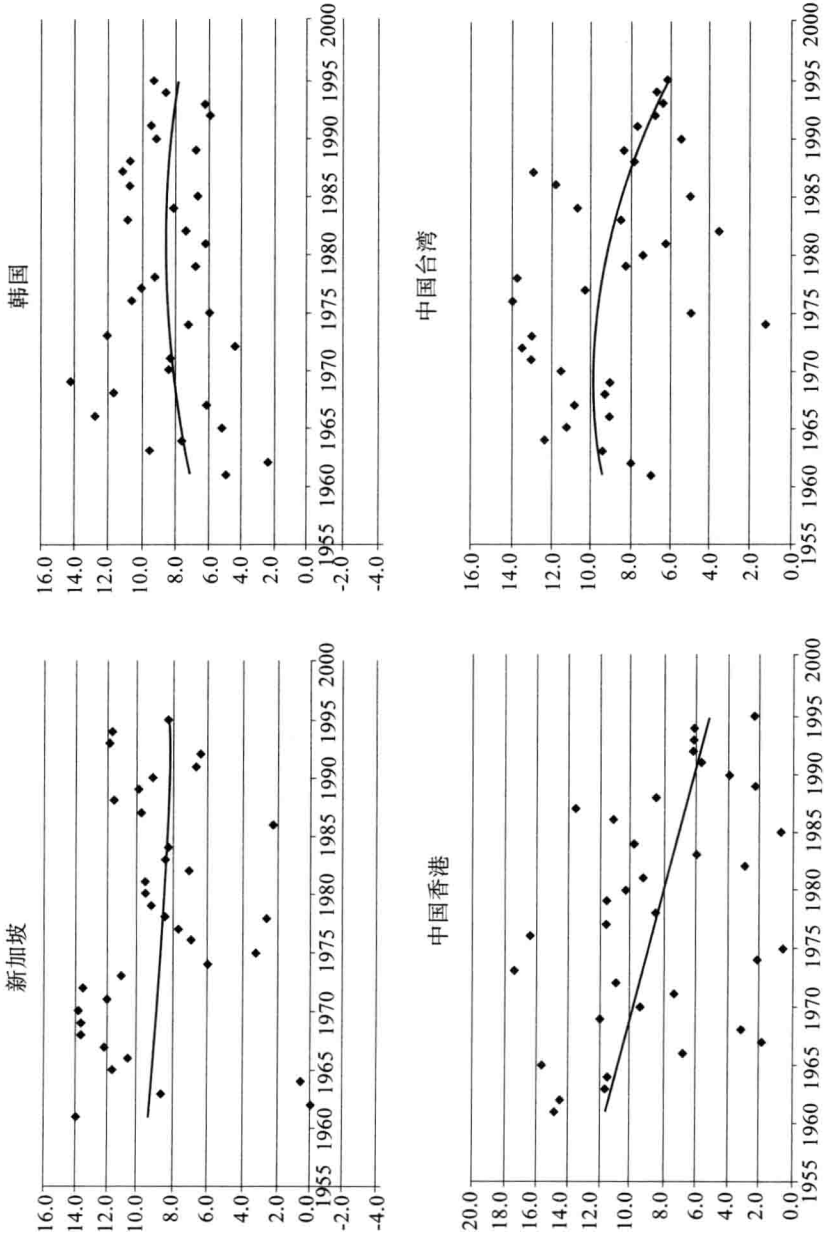


图3 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在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高增长率

来源：基于 World Bank's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nline (2012年11月14日访问)

增长为什么重要

来自当代印度的发展经验

经济政策与生产力

那么，导致印度在 1950 年到 1980 年的近 30 年间年均增长率只有 3.5% 的基本因素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有四个原因：^①

1. 存在广泛的控制私人投资与生产的体系。比如说，产业牌照管制了生产的扩张，甚至包括生产的多元化^②；进口牌照管制了所有的进口；投资牌照则管制了新的产能扩大。这种卡夫卡迷宫式的管制手段扼杀了创新、生产和投资，而且导致了无效率，因为在实质上，不存在由于进口和国内新企业所产生的有效竞争。

2. 公共部门不断地扩张，甚至在传统领域（如公共设施）之外的许多活动中也形成了垄断。结果，这些公共企业当然造成了无效生产，而相关损失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负担。^③

3. 基于自给自足的迷思来决定贸易政策。通过牌照制度，国内生产自动得到了保护。贸易经济学家 W. Max Corden 称之为“定制”保护。

4. 相似的，印度也控制了直接的外国投资，导致这个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量降到最低点。当改革于 1991 年启动时，当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共只有 1 亿美元左右，以印度这样的大国规模来看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些断送增长的政策背后有两件荒唐之事：

第一，经济活动中政府的大手无所不在，以至于我们中的一位作者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改革之前印度（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归结为找不到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

① Panagariya（2008，第 2—4 章）提供了大量关于印度发展前 30 年的管制政策的文件。

② 这意味着一个有生产 10 万辆汽车许可证的制造商不能利用它的产量来生产卡车。

③ 当然，在经济理论上，经济学家可以证明市场亏损是相容于社会所得的。不过一些印度经济学家，如阿马蒂亚·森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便指出，简单体现在高效生产中的公共部门企业损失，是源于其垄断地位和政治机构的臃肿。加尔布雷思对这一不愉快的现实深有认识，当他在肯尼迪总统任内担任驻印度大使时，将这种状况描述为“邮局社会主义”。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和金融家索罗斯谈到在自由化改革时认为它们实践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可事实上，印度的改革是实用主义的做法，从根本没有市场、毫无效率和增长的糟糕情况，走到了只能称为“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路上。

第二，反生产的政策框架也造成了闭关自守的贸易环境，以及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敌视，这意味着印度远离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也就无法利用这样的一体化来获得重大利益。^①贸易自给自足论的支持者，如智利社会主义者Oswaldo Sunkel的观点是“融入跨国经济会导致本国经济的分崩离析”。这种贸易开放会导致负面冲击的观点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东亚的良好经验有部分（如在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建构于支持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外国直接投资产生了多重的良性效应，如令本土企业也获得了相应的专门技术。不过韩国并非如此，它是模仿日本的替代政策，用进口替代的办法获得技术。印度则两方面都没有做好。由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普遍怀疑以及缺乏积极的技术进口政策，印度没有获得任何利益。

改革后的增长

改革所导致的印度增长之路与巴西在卡多佐总统之后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卡多佐是一位认为全球化将导致国家成为附属（这就是著名的“附属国”理论）的学院型社会学家，却领导巴西走向了全球化。同样的情况也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中国出现了。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些经济体即便在拥抱反贸易政策并否定市场的时候仍然取得了增长，因此不能把成功归因于自由化与支持贸易的改革。但这个观点颇为空洞，因为没有一种反贸易政策能在长时期内维持快速增长的实例。或许苏联有一度是如此，在差不

^① 许多经验研究利用大量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数据库，挖掘了增长与开放之间的正向关系。特别可参见Panagariya（2004）。当然该项研究只建立了相关性，尚未探讨贸易是否能解释增长，还是正相反。但它确实说明了抑制贸易的政策也会抑制增长。其他研究中最有名的如Frankel和Rose（2002），则建立了从贸易到人均所得之间的因果关系。

增长为什么重要

来自当代印度的发展经验

多20年中维持了高增长率，但接着便持续地衰退。自给自足再加上缺少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机制，将经济埋葬殆尽。

俗话说，经济学家从不赞成任何事情，不过已故的剑桥激进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很欣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主流的耶鲁经济学家盖斯·拉尼斯（Gus Ranis）则令人惊讶地赞同韩国的傲人成就。结果当她在思考韩国的时候，头脑中浮现的却是朝鲜。按这样的逻辑前进，她的思考当然是错误的。朝鲜的自给自足和高度反市场发展战略可以制造导弹与核武器，却无法维持总体增长。韩国所进行的“自由化改革”则保持了稳定的增长。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增长也是由于废除了人民公社，并引入对农民的激励制度。接着，由于持续的贸易开放和国外投资，东南沿海的广东省出现了海量的出口扩张，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技术吸收导致了中国人和增长率的提高。通过引入支持市场的政策，并取消经济内部对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不利的激励政策，中国远离了反市场原教旨主义，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增长。

东亚奇迹同样基于外向型贸易。在有技巧地融入世纪经济之后，出口实现了极高速增长。当印度还在实施准自给自足政策的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时，东亚经济已经越来越全球化了。^①结果，印度的工业被局限于国内需求。这意味着对工业投资的需求局限于国内农业收入的扩张。但由于从历史经验看，农业的增长很难持续超过4%，因此，东亚决定扩张外国市场也就意味着刺激投资所受的约束较少。投资的大范围扩张和出口增长带来的另一面是，东亚经济也能够生产包含了先进技术的资本品。

不过，仅这一点还不足以产生高额的收益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增长。要借助新技术获得最大的产出，劳动力必须接受足够的教育，才能使用先进机械。否则的话，技术进步并不能结出美好的果实。举例来说，老年人有了一台最先进的DVD播放器，但他只会用遥控器按“Start”和“Stop”键，那

^① Panagariya（2008，第6章）比较了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印度与韩国，表明贸易开放对后者的成功至关重要，而自给自足的贸易政策则是前者投资效率低落及因此增长低迷的关键原因。

么这台 DVD 播放器的生产力就和老旧的型号一样。东亚幸运地拥有包括初等与中等的义务教育制度——这可能要部分归因于日本对这些地区的占领，以及日本在教育大众方面的传统，参见日本大作家谷崎润一郎的自传（1988）——使得当地人民具有极高水平的读写能力。此外，像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这样的地区，能够自由地引进高素质人力弥补本土技术人员的不足，同时将本土人民送到海外的顶尖大学接受技能教育，再以高薪吸引他们回国。对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持欢迎的态度，加上数量庞大且有生产力的投资率，进口包含了专门技术的设备，以及在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群中实施提供额外激励与奖励的政策，创造出了一个产生东亚奇迹的良性循环。但这一现象的核心则是外向型贸易。

中国、印度和东亚的经验——它们的人口加起来接近世界总人口的一半——展现了通过融入世界经济，并熟练地利用市场激励以指导生产和投资，如何能够刺激和维持增长。^①反过来，它们也提出了如何摆脱破坏经济的政策框架。

有三点忠告必须牢记于心。第一，产生繁荣的是自由化的政策框架而非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也非某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它也容纳环境方面的目标，如通过提供价格工具（排放税）来代替直接的排放物数量控制，以减少国内污染。如果生产者可以直接将污染物排入湖泊河流，那就会导致过度生产，因为生产者的私人成本显然低于社会成本，忽视了对环境的伤害。因此我们需要对污染者征税，增加排放污染者的成本。分析这个问题的正确角度是，我们在污染方面存在一个“失踪的市场”，而征税则是找到了这个市场。要把它当成合理政策框架的一部分，你不必非得成为一个市场的狂热鼓吹者。

第二，贸易开放只是一个赋权机制。如果其他国内政策妨碍了对贸易机会的利用，那么贸易所得便相当微薄了。而如果国内对生产和贸易的限制

^① Panagariya (2011c) 近来又重新研究了 20 世纪 60 年代和 20 世纪 70 年代的台湾地区的奇迹，回击了如 Rodrik (1995) 和 Wade (1990) 等人的许多批评，并表明贸易开放再加上相补充的一整套市场友好型内部政策是关键所在。

增长为什么重要

来自当代印度的发展经验

影响了对出口产能的投资，任何贸易开放都会失败；要是资源无法流向新的或旧的出口产业，就没有办法获得实质性的贸易收益。用一个恰当的比喻来说，要是门开着，但你不迈开腿，就永远过不了那道门。

第三，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改变反生产的政策框架。这不过是华盛顿自负而已。发展战略之所以改变，并不是因为华盛顿的某个机构（如布雷顿森林体系或美国财政部），而是由于对自给自足和粗暴干涉经济的政策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分析。华盛顿的机构（主要是世界银行）为了合理的发展战略所开出的药方并没有包容这些想法。

在 20 世纪的最后 25 年，三个极其重要的国家——印度、苏联和中国改变了那些基于反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内向型自给自足政策的错误思路。如我们后面将讨论的，这些改变是自发的，而非华盛顿所强迫。公众和 / 或政治家们意识到“老”模式——斯蒂格利茨和索罗斯称之为“侏罗纪公园经济学”——已经不管用了，必须进行全面的改革。^①在反改革人士当中，“华盛顿共识”也是个流行词，因为这暗示自由化改革的背后有美国的影子，令反改革人士认为反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消退中。

在那些反对自由化改革的人士当中，现在很流行用“北京共识”来替代“华盛顿共识”，这个有点空洞的概念是想表明自由化发展战略已经被中国非常成功的国有主导型和国家驱动型发展模式所替代。^②

虽然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政策表明，自由发展模式的一个要素（开放贸易）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部分，但中国经济与政治的许多特征却引起了人们的疑虑。大量国有企业的存在并不仅是让政府能够控制这些企业，它还夹带了腐败和裙带关系。随着老百姓对腐败的痛恨，以及希望从快速经济增长分得更多利益，这样的模式很难持续。因此尽管中国的增长很快，但其可持续性却受到质疑。^③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混合的特色很难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效仿。

① 见第 6 章。

② 这个词汇是由前记者 Joshua Cooper Ramos 于 2004 年在英国的外交政策中心首先提出的。

③ 中国增长率应当会下降的其他经济理由，如劳动力变得稀缺，可参见 Bhagwati（2011a）。

增长与贫穷

如我们在本书中所指出的，印度的自由化政策与改革确实带来了增长。但仍有批评者认为这种增长是没有“包容性”的，它没有减少贫困，也没能让社会的边缘群体得益。经常有人指出应采纳再分配政策。这听上去很合理，但是根据印度和其他东亚国家的经验，事实并非如此。^①

在1980年，专研贫困问题的经济学家盖瑞·菲尔茨（Gary Fields）将印度描述为一个“悲惨的贫穷国家”。但随着改革的开展，尤其是1991年之后，糟糕的经济换上了强大的增长引擎，贫困率也降到了这个国家有史以来的最低点。由于印度是在同样的民主框架下，先采取命令型和自给自足的政策，然后又摆脱这些政策走向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因此它的经验能够为那些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以及为旨在消灭发展中国家贫穷的政府援助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经验。

常识告诉我们，快速增长的经济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为穷人摆脱贫困提供机会，而增长缓慢的经济则做不到这一点。贫穷而停滞的经济无法向穷人提供额外的工作。鼓吹增长的人们常常会面临“涓滴”经济学的失灵，就听上去像是诺丁汉伯爵与他的侍臣们在豪奢的餐桌上大啃鹿肉和烤羊腿，面包屑则掉到地上被农奴和狗吃掉。我们不关心概念或类比。我们用现在流行的“拉动”增长战略一词，它的描述更为准确：一整套激进的政策加速了增长，并将穷人拉动到更好的就业中。事实上，随着1991年危机后所启动的系统性改革，印度的增长迅速，同时也降低了贫困率。正如我们所表明的，边缘群体也分享到了好处，而且民意测验表明，这些群体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变好了。^②

① 东亚和印度在资本流入自由的经验上有差异。东亚被资本自由所击溃，印度则由于在这方面的谨慎而受益。和中国一样，印度的谨慎是有道理的，且现在获得了普遍的赞同。IMF赞成资本账户的可兑换性，Bhagwati在发表于*Foreign Affairs*的一篇被广泛征引的文章中指出，这会导致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流动之间的不对称性，现在该政策已经被放弃。参见Bhagwati 2011年3月9日贴于*World Affairs Journal*博客上的文章；该文修订后又于2011年4月15日贴在哥伦比亚大学网站上，题为“IMF Does *Mea Culpa* After All”（www.columbia.edu/~jb38）。

② 见第3章。

增长为什么重要

来自当代印度的发展经验

那么是什么机制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呢？巴格瓦蒂认为从差不多 25 年前起，增长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在农业部门内部）和获得更高收入的机会（比如说，移居到不断扩大的城市），直接帮助穷人跨过了贫困线，同时政府也获得了更多的收入，能够更多的支出在医疗、教育和其他进一步帮助穷人的项目上。^①因此，增长以双倍的力量消灭贫穷。

前改革时期的政策没有实现增长，断送了任何试图通过增长来减少贫穷的可能。缓慢的增长无法产生更多的收入，在提供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开支方面也就捉襟见肘。

为什么印度政府不通过提高税收或转移开支（如军费）来获得所需费用呢？巴基斯坦学者马赫布卜·乌尔·哈克（Mahbub ul Haq）常常提醒我们，计算表明减少一辆军用坦克可以建设 7 所小学，但他所加入的齐亚·乌尔·哈克（Zia ul Haq）内阁却从没有减少过军费，伊斯兰主义高举，却忽视人们的教育。数学计算不能解决缺乏资源的问题；只有采用促进增长的增长才可以。

此外，提高税率在民主国家中总是不受欢迎的。披头士的歌曲《税务官》精确地抓住了人们怨恨缴税（除非是让别人缴）的心情：

让我告诉你，结果将会如何
一份给你，十九份给我
因为我是税务官，对，我是税务官

留下 5% 太少了吗
感谢我没全拿走吧
因为我是税务官，对，我是税务官
如果你开车，我要对街道征税
如果你坐下，我要对位置征税
如果你太冷，我要对热量征税
如果你走路，我要对双脚征税

^① 见 Bhagwati (1988)。

最后一节说明了一切：

现在我要告诉那些死者
报上合眼前的每一便士
因为我是税务官，对，我是税务官
你只为我一人工作

正如印度自 1991 年起的改革所经历的，增长可以在不必提高税率的情况下增加政府收入。我们的分析表明，从那时起，印度政府才找到了足够的钱以支付医疗、教育和其他帮助穷人的项目。

与增长不同，再分配并不能消除贫穷。在如印度、中国和巴西这样的国家，穷人的数量极大，这意味着再分配的作用相当有限，而且也无法持续。一个农民一天只能得到一份麦饼（chapati）或玉米煎饼（burrito）：伟大的波兰共产主义经济学家卡莱茨基（Kalecki）在 1962 年就曾说过，印度的问题是“有太多的被剥削者和太少的剥削者”。要把饼做大，增长是必需的。^①

我们在本书还讨论到，尽管印度的增长是有包容性的，但由于印度的政策框架歧视数量庞大的企业，并且严格的劳动管制妨碍了雇佣更多劳动力，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没有像东亚经济国家那么明显。简单来说，如果能够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增长以及它的包容范围还能更为普遍。^②改革在不断进行中。反生产的政策框架无处不在，而且要在民主框架中进行改革是相当艰难的，我们将此描述为“海啸后的清理”。

第一类改革与第二类改革

我们把能够产生增长并且直接减少贫穷的改革称为第一类改革。而那些旨在提供医疗、教育和其他诸如农村地区的保证雇用制度等需要不断增加

① 显然，这对于如沙特阿拉伯这样富得流油的国家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但这又常常带来另一个问题——“资源诅咒”。

② 见第 8 章。

增长为什么重要

来自当代印度的发展经验

收入才能执行的改革，我们则称之为第二类改革。第二类改革必须站在第一类改革的肩膀上；没有后者，前者是无力开展的。印度的经验表明，随着自1991年开始的第一类改革，收入的不断增长使得这个国家能够大规模地实施第二类改革。

有趣的是，第一类改革增加收入并使得第二类改革能够实施的顺序也可以巴西为例来观察。巴西的卡多佐总统实施了第一类改革，继任者路易斯·卢拉（Luiz Lula）站在卡多佐的肩膀上，实施第二类改革以进一步帮助穷人。

第二类改革所牵涉的是整体社会工程，其中某些医疗和教育的话题会在第16章和第17章加以详述；它们是今天通过有智慧地利用新增收入（这也包括外援的流入）帮助穷人脱离贫困以及享受福利的关键所在。我们希望表明，帮助穷人脱离贫困这项任务是多维度的，但它们都围绕着作为核心战略的增长。

事实上，《经济学人》杂志2012年9月8日这一期的封面文章为《跨越（亚洲）大陆的各国正在建立福利国家——从西方的错误中汲取教训的机会》。这个故事就是关于第二类改革的。但它与增长并没有直接联系。在这期封面文章中，编辑发现，在第一类改革形成了长时间的增长之后，印度、中国和（程度稍低的）印度尼西亚等国开始转向第二类改革，这当然是可行的（前面已经谈到，巴西就是这样），因为第一类改革让它们国力大增。

有趣的是，与那些把增加的收入浪费在各种支出而非帮助穷人的国家相比，最鲜明地转向了第二类改革的国家正是印度。这表明印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为将增加的收入转向第二类改革提供了政治机制保障。像韩国这样的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增长极快，但只有在民主制度取代了威权体制之后，第二类改革才获得了加速的动力。中国的第二类改革也滞后于第一类改革。

印度为当代的改革提供了样板。增长随着第一类改革而至，不断增加的收入则用于第二类改革。借着这条路径，增长制造了双重魔法：将政治和经济联姻在了一起。事实上，这就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典范。